

『这些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走进党章守护者张人亚故居

□ 陈 光

在草长莺飞、春光明媚的日子，我从宁波市区坐地铁1号线到北仑霞浦站出口，坐车不到10分钟路程来到党章守护者张人亚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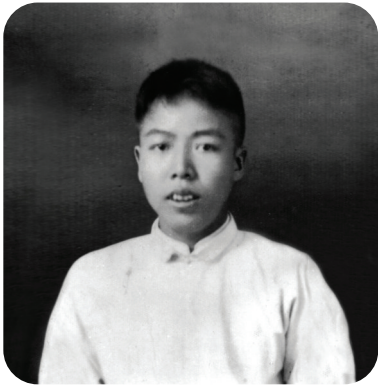
路经在马路草坪上“中共第一部党章守护地”的标识牌，它在告知人们：这里是党章守护者张人亚的故居；这里是“张人亚党章学堂”；这里是红色的土地。

张人亚是1922年入党的早期党员，是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领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守护者，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来张人亚故居瞻仰，是源于一篇报道：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参观过程中，他仔细端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译本之一。得知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是由一位共产党员的父亲藏在儿子的衣冠冢里保存下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还关切地问起那位共产党员。由此，张人亚的事迹引发社会关注，也触发了我来这里瞻仰张人亚故居的想法。

张人亚故居位于宁波北仑霞浦街道的霞南村，隐藏在村中的小巷中，是一座很不起眼的三合院式的建筑，屋顶是瓦片，窗门已陈旧，张人亚所住的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旧屋。张人亚的人生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受到与同住院子的晚清秀才张晚荷老先生的启蒙教育影响，张人亚很早就背诵北宋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人亚16岁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在读夜校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



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活动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此时的张人亚已经历多岗位的斗争历练，对敌斗争经验丰富。面对这严峻险恶的形势，张人亚精心谋划，把自己珍藏的第一部党章、《共产党宣言》等一批珍贵文献秘密带到了宁波霞浦老家，托付给了父亲张爵谦保管，并嘱咐父亲：“这些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把这东西收好了，找个地方藏起来。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相信我，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出现，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在那个年代藏有党的文献和进步书籍是有杀头风险的。但张人亚心系党的文献的安危，一点都不曾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为了心中的革命信仰，自觉地、主动地、勇敢地守藏党的文献。如今张人亚故居的院子门口立有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与故居一条马路之隔的长山岗上，是张人亚衣冠冢的地方。我们一行拾级而上，在小路的转弯处找到张人亚的衣冠冢，这里是守藏党的文献之地。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为了把党的珍贵文献守藏好，不使它丢失、毁损和“遭殃”，作了精心思考，感到藏在地下、墙砖内、炉膛中、树洞里等



都不是好办法，最终巧用衣冠冢，把党的珍贵的文献用油纸包好、包密，藏进空棺，为张人亚建起了一座墓，与他早逝的妻子合葬在一起，中间写成“泉张公墓”，故意少刻了“静”字。张人亚原名张静泉，在上海因革命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张人亚。对外还编了一个“不孝儿在外亡故”的故事用以遮眼。

张爵谦巧用衣冠冢的做法是一种“苦肉计”，明明儿子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却宁愿顶着“不孝儿在外亡故”的污名。在保护党的文献面前，父子俩都彰显了独特思路和行事方式。张人亚父子两代人用心、用情、用命完好地守护了党的珍贵文献，这是两代人的智慧结晶，是两代人的接力奉献，更是两代人的无限荣光。他们守藏的既是革命的文物，也是革命的火种，更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因张人亚杳无音信，年过八旬的张爵谦自感时日无多，于1951年挖开墓穴，取出深埋地

下20多年的珍贵文献，最终由三儿子张静茂把珍贵文献全部交给了上海的党组织，实现了张爵谦心愿：“共产党托我收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张家人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张人亚，却不知在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江西瑞金赴福建汀检查工作，途中因病殉职，生命定格在了34岁。党组织高度评价了张人亚的一生，称赞他是“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离故居不远处，位于霞浦中路210号的张人亚党章学堂是一座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占地5200平方米，是为讲好张人亚故事而建立的党员干部培训基地。这里完整展示了张人亚的革命历程和张人亚家族共同守护党的珍贵文献的感人事迹。

我看着张人亚用生命守护的这本泛黄的党章，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这里，我还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张人亚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封面上的字是从左到右而写，在醒目的书名《共产党宣言》的下行

标有陈望道译的字，中间是马克思的像。

宛若一个个炫目的红色元素，串联成一道红色风景，聚焦张人亚用生命守护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其功绩和价值可谓大矣：一是文献价值。截至2022年7月，发现张人亚珍藏的文物共有64件，其中《共产党宣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译本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含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无比珍贵的孤本文献。这些文物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这些文献对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党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二是精神价值。张人亚守藏党的文献，展现出了他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牺牲与奉献，彰显的是一个红色故事、一段浓缩历史、一份精神传承。张人亚34岁的人生长度的背后是让人仰望的精神高度。三是生命价值。人的生命价值不是以生命时间的长短来衡量，而是取决于生命的贡献。张人亚这个与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在党的历史上熠熠生辉、光耀人间。

告别张人亚故乡时已近黄昏，我还看见络绎不绝的人来这里瞻仰，顿时感到张人亚用生命守护党章的事迹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今天，千百万人正在张人亚身上汲取前行的丰沛力量，他的生命和事业还在延续。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一个民族的精神歌咏

□ 王锦慧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开国大典上奏响。

从那一刻起，这高昂的旋律响彻祖国大地，融入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生命乐章，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国歌是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神圣而庄严的“声音形象”。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让我们走进上海徐汇区，探访三所透着年轮气息的老房子：永嘉路371号，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永康路109弄雷米坊。

流年往复。四季的光影剥蚀着屋檐，却带不走砌进屋瓦里的记忆。当年三所老房子里分别住着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命名者朱庆澜，他们的所居方位勾勒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路径。歌声不时从失眠的窗棂中飘出，好像在呼唤着久别的主人。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系黑白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风云儿女》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聂耳配乐。影片荟萃了当时众多当红影星，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外，还有谈瑛、陆露明、王桂林、高逸安、王明霄等，周璇也在片中客串。

影片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青年诗人辛白华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被激发起磅礴的爱国情怀，奋勇投身抗战的故事。

为了凸显主题，影片在片头播放字幕时即穿插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人声合唱两遍，小号 and 军鼓伴奏4遍。以激昂的旋律开头，直奔抗日主题，这在当时的电影中是不多见的。

《风云儿女》的创作缘起于1934年初。随着左翼文化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组成以夏衍为首的五人左翼电影小组。

电通公司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支援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拍摄一部有关抗战题材的电影。

田汉接受公司委托，在他租住的永嘉路371号内，先写出了个文学性的电影故事，题名《凤凰的再生》。然而就在剧本筹拍之时，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夏衍亲自将《凤凰的再生》剧本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风云儿女》，使其更具有时代意义。

年轻的聂耳主动请缨为主题歌作曲。他埋首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一面对歌词进行修改，一面寻找和酝酿创作情绪，抑制不住的爱国激情终于在胸中喷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一呵而就，很快完成了初稿。

1935年2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很多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聂耳于4月15日乘轮船离开上海东渡日本。两个月后，他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最后定稿的总乐谱。

《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尚未对主题歌命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总乐谱上，也仅标注曲式为“进行曲”。于是，朱庆澜将军挥笔在“进行曲”前加上“义勇军”3个字，将主题歌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聂耳合作的绝唱

《风云儿女》一公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它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吹响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血战到底的战斗号角。

1935年7月，田汉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狱，听到这首感慨万千，激动不已。但聂耳在日本横滨溺水不幸遇难的消息接踵而来。“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他禁不住失声痛哭。

田汉和聂耳结识于上世纪30年代初。1928年1月，田汉在上海法租界以“革命运动”为宗旨进行戏剧创作活动。1931年，聂耳在上海明月歌舞剧社当首席小提琴手。1932年，日军

音由这里发出，又隐喻着聂耳24岁的生命历程。墓地遍植苍松翠柏，如月琴静置于清幽的山林间，风过处，难分松涛琴音。

墓志铭上这样写着：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震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就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

根据有关国歌的档案，从拟定国歌提上日程到将《义勇军进行曲》暂定为国歌，实际上仅用了3个半月时间。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国歌作出新的决定：曲子仍采用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曲，而歌词由集体重新填写。会后，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激发着中国人民炽热的爱国热情，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从此，《义勇军进行曲》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2017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进一步维护了国歌的尊严，规范了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

响彻云霄的乐曲

自从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唱响，迄今已栉风沐雨传唱了近90载。

从《申报》1937—1940年间的历史记载中不难看出，无论是蓬头稚子还是耄耋老人，无论是在危机重重的战场、纯真神圣的学堂或是再寻常不过的坊间巷陌，《义勇军进行曲》为千千万万同胞抒发心中压抑的国恨家仇找到了情感寄托，为他们以一己之力表达爱国情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找到了一种倾吐方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将《义勇军进行曲》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曲目，代表着中国的最强音。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公祭仪式、升国旗仪式和国家重大庆典、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上，《义勇军进行曲》永远是响彻云霄的最撼人心魄的乐曲。

《义勇军进行曲》何以成为穿越时空、世代唱响的不朽旋律？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新中国的“国歌”身份，更因为它承载了中国人民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熔铸了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寄托了华夏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希冀。

还因为——

它是从热血里奔流出来的，从情感中迸发出来的，所以才那么真切、那么感人，产生那么巨大的社会影响。

它全曲共有37节，时长只有短短40多秒，但完全突破了歌曲创作的一般模式，采用长短不一的乐句，跌宕起伏、疏密有致，演唱起来既铿锵有力，又自然奔放。

它和全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尤为深沉，发出的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之呐喊，跨越国界成为世界人民反击外敌侵略、保家卫国的象征。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河山到走进新时代、新征程，始终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

